

特约专稿：中国养猪史连载之七

宋元时期的养猪业

徐旺生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 北京 100125)

宋朝(960年—1279年)分为北宋(960年—1127年,首都开封)与南宋(1127年—1279年,首都杭州),合称两宋。五代后周显德7年1月(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史称北宋。鉴于一些将领、节度使可能如法炮制,像赵匡胤一样,拥兵自重而影响皇权,宋太祖听从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使兵、将分离,保证了统治权的集中,但是同时削弱了军队战斗力。976年10月,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

北宋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到了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由此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但是后来遭到保守派反对而废止。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1127年,金国军队攻入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南宋建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与宋朝同时存在的政权还有契丹、西夏、金,其后兴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于1279年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建立中国境内版图最大的蒙元帝国,南宋灭亡。1368年蒙古人退居今天外蒙古一带,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元朝灭亡。

由于宋元时间跨度较长,我们先了解两宋的养猪业。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人口大幅度地增长,经济的繁荣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宋代太湖平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20世纪末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根据漆侠的估数计算,在两宋时期中,江南亩产量增加了116%或120%,南宋时期内增加了86%,而在唐宋时期则增加了1~2倍。正是由于宋代亩产量的大幅提高,所以漆侠认为南宋太湖平原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尽管李伯重不认为宋代江南一带粮食产量如此之高,但还是承认江南农业在宋代确实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的变化,即农业生产重心从与江南平原毗邻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的“高田地带”向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的转移。这个转移并不意味着“低田地带”的农业技术与亩产量在宋代发生了剧变。相反,这个地带农业的更大发展,是在农业重心的转移已完成之后的明清时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宋代农业产量存在提高,原因是占城稻的传入,稻麦二熟制度的推广,促使粮食产量提高,而这些因素势必导致农家养猪规模的扩大。

宋代是历史上记载养猪较多的朝代,无论是关于养猪文献记载的数量,还是养猪的规模,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符。通过这些记载,我们能够比此前历史时期了解更多一些其养猪业的发展概况。

南北宋疆域不同,但是由于文献记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两个时期养猪所展现的养猪概况完全不同。原因之一是文献所记的南宋时期资料远远多于北宋,原因之二是由于南宋主要偏安于江南,江南地区水稻生产产量较高,大大有利于养猪的发展,所以猪的养殖自然比前朝要显得更加兴盛。

首先看北宋时期的养猪概貌。峡州夷陵县(今湖北宜昌)几乎家家养猪,“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说明当时多是人猪共处一室。王禹偁有诗记载当时的养猪采取放牧的方式。其曰:“北邻有闲园,瓦砾杂荆杞,未尝动耕牛,但见牧群豕。”荆湖一带的民间养猪很普遍,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发现当地“猪、牛、麋、鹿如土,鱼、蟹不论钱”。上述的文献所记主要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养猪概貌,大体代表南方地区养猪的概貌。其他地区的情况所记甚少,但看看都城开封猪肉消费情况,就可以略知当时整个国家养猪的概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末年都城开封从正与大内相对的南熏门赶猪进城的情况,书中称:“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按这个记载推断,当时猪的养殖总体数量应该很多,也说明北宋都城猪肉的需求量也颇大。“止十数人驱逐”而“无有乱行者”说明赶猪的人数少,对猪群的活动规律性已有充分的了解。东京开封“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还有著名的“杀猪巷”。由于

生猪肉销售量太大,给市场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虽有专门的肉市,但也出现了到处摆摊设点的现象:当时的开封“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煨爆熟食上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肉市上出售的既有生肉,也有熟肉,品种齐全。

北宋时期河南府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一屠家,“豢猪数十头”,自养自卖,可视为养猪专业户,亦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养殖产业化经营之举。由于养猪业的快速发展,政府规定养猪也要征收杂税。苏辙贬谪筠州(今江西高安)时,“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京西路河阳县(今河南孟州)养猪不仅多,而且所产的猪肉质好,远近闻名,苏轼在陕西为官时,“闻河阳猪肉至美,使人往致之”,即不远数百里派人往河阳买小猪饲养。

养猪普遍还可以从当时的价格便宜上间接了解到。淳化年间京畿百姓牟晖丢失了1头猪,朝廷赔偿其1000文钱。宋代一匹马的价格在25贯至50贯之间,那么1匹马可以买25至50头猪,这说明猪比较便宜。有文献记载诗人苏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州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是东坡以文滑稽耳”。说的是黄州一带猪肉极其便宜。

到了南宋,记载养猪情况的文献明显增多,这也帮助我们对当时的养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先看看消费情况,就可以知养殖的盛况。南宋临安府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吴自牧《梦粱录》“肉铺”记载过南宋都城临安每日宰猪的情况:“坝北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这样大的屠宰量,必然是以更大的存栏量为基础的,此时各地纷纷运送活猪至临安的景象也应该十分壮观。从书的描

述可以看出,当时南宋临安猪只屠宰的“肉市”和零售的“肉铺”生意都很兴隆。“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对猪肉已经依据各个不同部位和肥瘦区分售卖。而且不到中午,肉、骨均可卖完。书中称:“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盖人烟稠密,食之者众故也。”临安即今之杭州,宋词中称当时人口已经有几十万人,食肉量大应该可以理解。

当然,城市之中食肉可能较平常,而在乡村中,则未必,一般老百姓食肉情况不得而知,南宋陆游游山西村诗曰:“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其中说到丰年留客足鸡豚,应该是杀鸡买猪肉这一行为。一般说来,丰年留客,多备美食,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肉食自然是最好的待客之物,至于平民日常是否能够足鸡豚,显然要打折扣,不能乐观。

从部分文献的记载来看,南宋时期,民间养猪业相当兴盛,尤其是南方更胜一筹,这应该与南方相对发达一些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关。宋代,随着隋唐以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稻作农业迅速发展,国家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南方,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农产品剩余自然会多起来,东南地区的养猪业因此兴旺。如淮南民间普遍养猪,甚至不少家庭“养猪数十口”。鄂州也是“鸡豚兼蓄,枣栗成林”。由于猪多,猪肉非常便宜,有“淮南猪肉不论钱”之说。江南一带的民间大力发展养猪业,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猪羊满不知金贵”,歙州(今安徽歙县)一般家庭饲养“大豕至二三百斤,岁终以祭享”。与江东相邻的两浙路,一般农家都要养猪,如湖州“田家多豢豕”。辰州叙浦县(今湖南溆浦)因猪太多而又管理不善,结果导致县常平仓墙壁为“群豕所穴,食

仓米五十石”,即猪吃掉了县常平仓中为人所备的粮食。

荆湖地区有官员居然还有利用官衙养猪,且数量不小。南宋宁宗时期,安丙与杨巨源、李好义谋诛杀吴曦后,安丙又杀掉杨巨源,专有其功。朝廷猜忌其专横跋扈,让他在沙做官。安丙到来后,“设厅前豢豕成群,糞秽狼藉,肥则烹而卖之”。安丙为了减轻朝廷对他的猜忌,处心积虑地佯装在长沙从事养猪,以利于保全自己。从而也看出来,在当时,养猪业者的地位不高,在多数人眼中,养猪即是没有志向的普通农民所为。安丙养猪,被人视为混日子之为,故能够让疑忌者放心。

当时的岭南,一般百姓家中养有猪、牛等家畜,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说:“深广之民,结棚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牛豕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述。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为了避免虎狼的袭击保护牲畜的安全,岭南之民只得忍受着与畜禽近距离接触牛豕之秽。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岭南地区认为“五谷滯而不甘,六畜淡而无味”,部分地区的人们甚至“不食彘肉”,养猪主要用于祭神。陆游在广西桂林看到舟人祭神一次就用了10余头猪。说明当地祭神是推动养猪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除一般家庭养猪外,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养猪专业户和养猪大户,这是宋代养猪业兴盛的表现之一。如江陵(今湖北江陵)民莫氏,“世以圈豕为业”,即以养猪代代相继而闻名。乐平县(今江西乐平)广衡人许光仲之仆,“畜一牝豕。凡历岁,每生豚必以十数,满三月则出鬻,累计二百不啻,获利已多”。许光仲的仆人依照孟子所言“子欲速富,当畜五牝”,专门饲养母猪,待生小猪后而卖钱,等仔猪喂养3个月就可出卖,供其他人继续饲养,累计达200头以

上,自然获大利。何薳《春渚纪闻》卷三记载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这比今天养猪大户也不逊色。京东西路单州砀山县(今安徽砀山)养猪较多,是重要的生猪输出地。

简而言之,南宋时期民间养猪业总体上应该比北宋要规模大一些。随着养猪业的兴盛,宋代出现了许多以贩猪为业的商人和以杀猪为业的屠夫,不少人因此还发家致富。据《夷坚志》记载:鄂州的张二与朱四经常“买猪于汉阳”。即远处贩猪。常州无锡县(今江苏无锡)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台州(今浙江临海)的屠夫童七,“累世以刺豕为业,每岁不啻千数,又转贩于城市中,专用以肥其家”。饶州余干县(今江西余干)古步小镇为商贾往来通道,“屠宰者甚众”,不少屠夫“擅其利数世”。由此可知,宋代从事屠宰业的商人具有从业人数多、经营规模大、从业时间长、累世相传等诸多特点。

随着养猪业的发展,屠宰业也因此而专业化,大城市中一些生猪销售点和屠宰点也开始由分散走向集中。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了南、北猪行,南猪行在候潮门外,北猪行在城东。临安的生猪屠宰业尤为兴盛,城内修义坊,“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临安还出现了专门批发猪肉的屠长,“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然后众屠儿分契以去”。生猪销售和屠宰业由分散走向集中,是市场规范管理的要求,也是宋代养猪业发达的重要表现。

南宋时期在祭祀时,有的地方政府还强行向民间摊派猪羊。如襄城县(今河南襄城)每年祭祀向民间摊派猪羊,吴育任知府时才免除了这种苛税,结果所需猪、羊全部由政府负责,“民省供赏殆半”。

南宋临安的猪肉和北宋一样,也特

别便宜,史载:“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头蹄血脏。遇晚烧晃灯拨刀,饶皮骨,壮汉只吃得38钱,起吃不了,皮骨饶荷叶裹归,缘物贱之故。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两肉,卖九十省,一斤”。一个壮汉买了38文钱的肉还吃不完,可见猪肉价格的确很贱。如此低廉的价格,意味着广大下层百姓都可以吃到猪肉,庞大的消费群体客观上促进了宋代猪肉的销售和养猪业的迅速发展。

与宋朝同时的还有当时辽与金的养猪业,据《辽史·地理志·南京道·南京析津府》卷四十记载:“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阳氏谓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为幽州。商并幽于冀,周分并为幽。职方,东北幽州,山镇医巫闾,泽薮獮豸,川河、沛,浸菑、时。其利鱼、盐,其畜马、牛、豕,其谷黍、稷、稻。”当地种植粮食作物如黍、稷、稻,饲养的家畜马、牛、豕,与中原地区无异。不过,辽代契丹牧养的牲畜以马为多,此外依次是羊、牛、驼和猪,猪的数量最少,以至于北宋使者误认为契丹“俗不养猪”。

《金史·地理上·上京路》卷二十四记载:“会宁府,下。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后置上京曷懒等路提刑司。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旧岁贡素王鱼,大定十二年罢之。又贡猪二万,二十五年罢之。”

金上京会宁府猪的饲养量大,质量好,会宁白猪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优良品种,从皇帝到贵族王公大臣,都十分喜欢会宁猪肉,海陵王迁都北京之后,始终吃会宁猪肉。因此,这里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会宁贡猪2万头,平均每户接近1头贡猪。

元朝对于养猪业曾经相当重视。但是到了元代中期,由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导致元顺帝禁止老百姓养猪。元顺帝曾

经在晚上做梦大瓮没城,于是禁民养猪。不过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可能与游牧生活的蒙古族在统治中原从事农耕的民族过程中,因为民族关系而产生的偶然事件。元·周密所著《癸新杂识》(1296)有类似的记载,其曰:“至元癸巳十二月,内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

但是总体上,养猪在元代还是受到保护的,这在当时的刑法制定上可以得到反映。《元史·刑法三·盗贼》卷104记载曰:“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如果出现盗窃猪的事件发生,判刑还是比较重。不过其等级在驼、马、牛的背后,与羊相等。

而有关元代养猪业发展的情况,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公元1289年)一书中有所提及,书中说到他当时在浙江省的衢州旅行时见到的情景是:“在这个地区,看不到绵羊,但有许多公牛、母牛、水牛和山羊,至于猪的数目则特别的多。”这些都反映了元代很重视内地农区家庭副业猪的饲养,所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过,从总体上讲,元朝的养猪业基本与先前的情形一致,中国农区养猪业的水平依然是副业,与前代没有本质的区别。

(收稿日期:2010-10-20)